

大航海時代與鄭和下西洋

邱華君*

摘要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時代，歐洲船隊在世界各地尋找可開發地區資源與新線航路的時期，探尋新的商業貿易路線和夥伴，以期發展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大航海時代在遠洋航海探索中，西方歐洲人發現了許多當時在歐洲國家不為人知的國家陸地與島嶼地區。各國君主想藉找尋新世界去擴張佔有領土，航向未知海洋展開冒險旅程。伴隨著新航路線的開闢，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商業貿易開始大量增加，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也開始出現。歐洲這個時期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其超過亞洲繁榮的基礎。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產生了久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揚國威，另說還有一個目的是尋找明代建文帝的行蹤。明史·鄭和傳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為人類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早近百年，規模最大、歷時最久二十八年的西洋探索航海行動，且航程最遠，航海史上技術設備提升，由此打開海上絲路的壯舉。

關鍵詞：海權時代、地理大發現、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大航海時代

壹、前言

全球每一世紀幾乎都會有大事發生，於十五、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不僅是地理大發現的全盛時期，更是全球文化和經濟交流的開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航海探險家們，不但開闢了新的商業貿易路線，更催化改變世界地理的面貌。歐洲人航海家們的成就，對未知的世界探險以致對後世的航海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鄭鶴聲，2005，頁 14）。大航海路線如圖 1 所示：

*邱華君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副理事長，考試院顧問，世新大學兼任教授。電子郵件：james410925@gmail.com
本論文經 2 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稿：2025 年 1 月 14 日。同意刊登：2025 年 2 月 17 日。

圖 1

大航海與鄭和航海路線



資料來源：翰林雲端學院地理大發現路線圖

地理大發現（又稱大航海時代）¹是從十五世紀，歐洲船隊在世界各地尋找可開發地區資源與新航路線。發現了非洲、美洲等地，與歐洲宗教文化交流、商業貿易量大為增加，其後歐洲就開始對各地經濟殖民，此舉對歐洲大陸財富與自然資源的累積了深厚的基礎（張箭，2002，頁 31-32）。鄭和（1371-1433）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航海規模最大、船隻船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要比歐洲國家航海時間早九十年，乃是明朝國力強盛的直接體現。鄭和的航行之創舉遠遠超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航海家，如麥哲倫（1480-1521）、哥倫布（1451-1506）；（陳太先、陳禮仁，1983，頁 30）達伽瑪（1469-1524）等人，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領導先驅是唯一的東方中國人（鄭鶴聲、鄭一鈞，2005，頁 63），更是比馬漢（1840-1914）早五百年提出海權論者，馬漢海權論（sea power）三部曲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更有稱鄭和最早發現美洲、澳洲、南極洲。是以，明初鄭和下西洋揭開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大門，是中國邁出外部世界的指標；鄭和以多元（佛回基天）宗教文化互融，打通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踐，創造中國的航海事業銘刻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里程碑。

貳、大航海時代的時空背景

一、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為社會成員的認知發展、價值判斷、行為方式、心理過程起持續影響和規定作用的人文環境（Barnett & Casper, 2001）。於十五世紀前期，約翰尼斯·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7-1468）是歐洲地區第一位發明活字印刷術，

¹ 大航海時代，又稱地理大發現，指在 15 世紀-17 世紀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發起的泛跨洋活動與地理學上的重大突破。這些遠洋活動促進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間的溝通，並隨之形成了眾多新的貿易路線。所謂「大發現是以當時歐洲人的視角，而非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發現。有人誤以為「地理大發現」是單純的發現北美新大陸，其實是幾個地理事件的綜合。15 世紀末到 16 世紀初，歐洲人開闢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繞道非洲南端到達印度的新航線以及第一次環球航行的成功，歷史上習慣稱為地理大發現。

標誌著活字印刷術首次在歐洲應用。在歐洲迅速傳播，能高效經濟地印刷書籍，徹底地改變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事蹟進程。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中期，歐洲爆發了義大利戰爭 (Swaine & Tellis, 2000) 殃及多數義大利城邦 (city-state) 以及英格蘭、蘇格蘭。在十六世紀，許多宗教家、哲學家與政治家們試圖從廣度和深度上改變西歐天主教的思想與風俗習慣。這時期開始於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發起德意志宗教改革 (麥格夫, 2006, 頁 19-20); 後來擴展為影響全歐洲的宗教改革，並促成基督新教的興起 16 世紀末葉。法國的新教胡格諾派 (Huguenot) 與天主教之間曾爆發過 8 次戰爭，史稱法國宗教戰爭 (1562- 1598) (張芝聯, 2009, 頁 97)。此時歐洲民眾開始強調個人信仰的獨立，再因文藝復興息息相關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興起，肯定人是生活創造者和主人，促使歐洲的哲學、語言學、藝術文化和教育領域中成了主導地位。更標誌著歐洲文化全球擴張正式全面時期，在十七世紀，發生西班牙逐出伊比利半島的伊斯蘭征服者摩爾人與三十年 (1618-1648) 戰爭。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一場反映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 (王晴佳, 1999, 頁 36)。地理大發現、民族國家的誕生都是源於文藝復興 (Renaissance)。加上宗教的因素對大航海時代的興起產生重大影響，十五世紀的歐洲是一個由基督教教廷

(Patriarchal Curia) 主導負責管理各地方的教會事務的時代，宗教信仰對於人們的生活和信仰具有重要意義。當時，基督教世界對東方傳統的興趣和渴望導致對新航路的探索，信仰和新的精神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推動大航海時代的發展，新教國家試圖透過擴張殖民領土找尋新領地資源和財富，及擁有傳教區來鞏固其宗教改革和政治思想專制權威 (鄭鶴聲, 2005, 頁 87)。

二、商業貿易

商業貿易，是指個人、企業、國家之間的規模較大的財貨或服務互換，並且經常牽涉使用貨幣物品進行交易。一個讓貿易得資源以進行稱為「市場」。成為西方國家的探索動力：大航海時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5 世紀的歐洲。當時，歐洲國家面臨著多種動力因素，促使他們步入海上探險的道路。探索時代的開端，是由於商業貿易上急迫需求的刺激。最初的遠洋航行，是為了尋找從西歐前往亞洲的海路航線，以帶回東方的香料 (張箭, 2002, 頁 42)。早在古埃及時，亞洲的香料便在西方廣為人知；因香料貿易已成利潤最高的商業貿易領域。因此，派遣探險隊去尋求更好的價格，形成當時歐洲強權們的爭奪常態。另一個重要的動力因素是經濟利益。歐洲國家在大航海時代之前主要依賴地中海貿易，但隨著奧斯曼帝國 (Osmanlı 1299-1923) 崛起，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文化上採取東西交融，極盛時期橫跨歐亞非三洲。地中海貿易受到了威脅。歐洲國家迫切需要尋找新的貿易路線和資源，以維持其繁榮和經濟實力，但由於地中海被奧斯曼帝國封鎖，非常渴望能和東亞地區直接貿易，於是決定開拓去東亞的新航線。長期以來，與中國、印度的經濟貿易，一直是握在阿拉伯人作為中介的，而在整個歐洲，與阿拉伯人的商業貿易幾乎都掌握在義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手裡 (張箭, 2002)。為打破義大利商的專利權，在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各國君主還有商人

們都急切地希望能夠突破義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壟斷行為，獨自前往印度、中國和香料群島等地，直接與當地人進行交易香料、絲綢等商品交易。

另則，Parry (1981) 認為香料（是一些乾的植物的種子、果實、根、樹皮做成的調味料的總稱），對於中國人、印度人而言，毫無吸引力，導致了歐洲人只得用大量的金銀來換取香料和絲綢等商品。長期的人不敷出，歐洲人對於獲取金、銀、寶石或者直接獲取香料等資源顯得十分感興趣。但此，那些出產這些珍貴天然資源的國家地區，便成了歐洲國家商人獵取與互相爭奪市場搶手喜愛的商品（Love, 2006, p.58）。

三、航海技術

航海技術是具有悠久歷史、內容豐富且有很強的實踐性的綜合性套用科學。科技和航海技術的進步為大航海時代的實現提供技術基礎。在這個時期，航海技術得到顯著的改進，航海術的改良如指南針的使用、航海圖表的製作、船舶設計的改良等使航海技術取得長足的進步。十五世紀末，歐洲人又發明了星盤，可以幫助水手尋找他們在海上的位置，大大增強改善航海技術。

人類最早指南針時代到來前，幾乎全歐洲的航海者都認為「方向」就是「風向」。後來發明的航海工具是羅盤，也就是指南針的雛形。指南針是一種用於指示方向的工具約在 12 世紀由中國傳入歐洲，廣泛應用於各種方向判讀，譬如航海，後來又被歐洲的航海家改造成指北方向。1250 年時，航海磁羅盤已發展到能連續測量出所有的水平方向。且那時航海者在海上總是保持與岸邊比較近的距離航行，通過他們能夠看到陸地特徵來判斷航向是否正確。通常進行航行，仍停泊在港內或拋錨在海面上。中世紀盛期歐洲各城市的商船大多採用沿岸航行，沿著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的地中海海岸作迂迴航行，沒有一個船主敢冒險出海到望不見陸地的洋面上去（Love, 2006）。因為他們認為，那碰到暗礁和淺灘的船難的危險程度，總不如沉沒在大海裡可怕。而他們不敢穿洋直航，有三個原因：一是怕迷失方向；二是害怕遠洋中的風暴；三是害怕遭到海盜襲擊。但歸根到底最終考慮還是第一個原因，後來導航技術進步，雖然第二、三個原因的依然存在，但船隻已敢作穿過洋遠途航行。因此技術進步使得歐洲航海家能夠大膽勇敢地面對海洋挑戰，航行更遠的距離，而不再依賴昔日沿岸航行。且自從有了星盤之後，人們就可以航行去很遠的地方（Arnold, 2003）。遠洋航行所需的技術也在不斷發展。對於航海家而言，他們能夠在海上活動，除了宗教信仰以外，他們更多的是依靠來自各地的科技：各國發達的造船業才是在海上最可信賴的依靠。而在這些航海科技流傳至歐洲之前，沒有人會打算到世界「邊緣」去冒險，地圓說（Dicks, 1970）主張地球形狀近似於球體（globe）的理論消除了航海家從地球墮入地獄的擔憂。從 12 世紀開始，歐洲人便開始製造用於航海的大型船隻。自 1200 年至 1500 年間，歐洲普通船舶的噸位普遍增加了一到二倍。在短短的幾個世紀之內，他們或是從阿拉伯人那裡學會了使用，或是自己動手發明改造了諸如航海圖、磁羅經（Magnetic compass）、航行方位圖等等工具或船隻設備技術，使得歐洲人擁有了在各種複雜海象氣候

條件下操作技術進行遠航的能力。甚至於政治背景也對大航海時代的興起已影響國力強弱變化作用，當時的歐洲國家之間存在著國家競爭力和爭奪殖民領土的需求。歐陸國家為了宣示國富民強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政治影響力，君王紛紛資助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這種政治競爭促使貿易路線探險和殖民活動的加速進行航海發現新陸地遠海航行。由此可見，大航海時代的崛起與經濟利益、宗教因素、科技進步和政治競爭及商業貿易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和交織在一起，共同加速推動大航海時代的發展和殖民擴展（張箭，2003，頁 63-78）。

四、結果演變

一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或文化優越感，以政治、軍事力量壓迫其他國家，對殖民地進行經濟掠奪、思想改造、種族歧視、土地佔領，這種行為與觀念稱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由於帝國主義 (Lewis, 1989) 與殖民化，大航海時代的擴張和探險活動導致帝國主義的興起，歐洲國家透過殖民化活動建立海外殖民地（張箭，2003，頁 31-32），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在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瓜分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給歐洲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包括原材料和貴重商品，並建立不公平商業貿易壟斷行為，以滿足國內的需求並實現經濟貿易最大利益。然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也帶來嚴重的後果，殖民地居民經歷了剝削和壓迫，他們被迫為殖民國家提供勞動力和生產資源，導致社會和經濟立於不平等對待，以致許多殖民地地區的文化、傳統習俗和天然地理資源遭受嚴重的破壞。而且殖民主義是一個國家透過戰爭或其他衝突方式尋求或取得土地及其土著居民的控制。並取得當地的實質特權，掠奪土著居民的財產，或建立使他們處於地位不對等的法律和各種不利土著的行政措施。甚至對反抗的土著加以殺害、強制同化或趕走土著居民。然後以歐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移來取代，這些西歐定居者在當地形成了少數群體，但卻擁有統治權 (Howe, 2002)。雖然大航海時代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歐洲航海家與其他地區的人民進行接觸和交流，帶回了新的思想、藝術和科學知識，這種文化交流促進文化的多樣性和互相影響，豐富人類的文化遺產。同時，航海家們也將歐洲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傳播到新的地區，這種文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並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融合現象。另地緣政治²與權力平衡³的改變 (Boies, 1970)，大航海時代對地緣政治 (Geopolitics)和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產了深遠的影響。

²地緣政治是政治地理學說中的一種理論。主要是根據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地緣政治在解析國家間如何因地理條件發生互動。地緣政治學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著重國家形成、發展和衰亡的規律。

³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權力平衡作為外交政策主軸，此一政策可稱為「均勢原則」 (A doctrine of equilibrium)。其目標是使相互競爭的各方勢力處於一個相對穩定、彼此牽制的狀態，不使任何一方過於強大而打破均勢，破壞穩定成為霸權 (hegemony)，主宰國際體系。

歐洲國家透過探險和殖民化活動擴大自己的領土和勢力範圍，形成海上貿易帝國。這種權力的擴張和競爭導致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同時也改變了全球的權力平衡（竹田勇美，2021，頁 156）。此外，大航海時代的發展也加速亞洲、非洲和美洲國家的崛起，他們開始反抗歐洲的殖民統治，並爭取獨立和自主發展，這種反抗運動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國家的霸權地位。縱觀世界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擁有工業資本優勢的國家，也往往是擁有強大海權的國家（阿諾德，1999）。大航海時代的發展也加速了亞洲、非洲和美洲國家的新興崛起，他們開始反抗歐洲國家的殖民統治，並爭取獨立和自主發展空間，這種反抗運動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歐洲國家的霸權地位。總體而言，大航海時代對世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開啟了全球化的新時代，推動文化交流、經濟發展和科學進步（阿諾德，1999，頁 133）。

然而，所帶來了不平等對待、權勢壓迫和利益衝突，如何解決？對於當時世界的形成新局和演變，期能我們有進一步了解新航路的開闢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產生久遠的影響，促進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打破各大洲之間的相對孤立的狀態，而大航海時代的世局變化世界日益成為一個相互影響，聯繫密切的整體環境世界。

叁、鄭和下西洋早在大航海時代

一、元代萌起

在我國元代，中國與亞洲乃至世界各國展開的貿易是廣泛而普遍的，一艘中小型的船隻，竟然能裝載如此多的貨物，說明貿易規模的宏大。我們可以想像，在那個時代，中國大大小小的船隻航行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線上，使開闢千年以上的「海上絲綢之路」異常繁忙。隨著時元代造船、航海、海外貿易、海上用兵等情況的不斷認識，我們可以斷定，我國元代是中國史上一個獨特的航海時代。元朝是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在征服漢人地之前，已經征服了中亞，勢力已遠歐洲。元朝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以往漢人朝代都不相同，有着明顯的特殊性。為中外使者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條件。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為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滅亡南宋，統一中國，建立了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元代出使海外的使節不僅有漢族人，還有其他各族的人，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成立了泉府司，該機關專管海運，在上海和福州設置兩個萬戶府，至元二十三年將市舶司劃歸泉府司，這樣就使出使海外的官商人員和船舶有了專門管理的機關，更加有利於對外交流。經過滅亡南宋的戰爭，元代統治者認識到了發展造船和航海事業的重要性，繼承了南宋造船與航海的若干好東西。至元十一年（1274）和至元十八年，忽必烈兩次發兵進攻日本。至元十九年，海上進攻安南（今越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遠涉重洋南征爪哇。這五次海上用兵所出動的水師兵力，少則五千人，多則十四萬人；戰船少則五百艘，多則三千四百艘（馬駿杰，2021，頁 20）在造船方面，元代形成了驚人的造船能力。戰船往往能體現當時最高的

造船水準，以戰船為例。元朝從南宋水師那裡學到了造戰船、習水兵的很多方法。至元七年（1270 年）三月，南宋降將元漢君都元帥劉整（1211-1275）與元蒙古都元帥阿術（1227-1287）商議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宋史紀事本末」造戰艦，習水均，則事濟矣。於是二人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皇帝下詔許之，遂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七萬。攻占襄陽後，更令增練水師五、六萬人，再造戰船三千艘。這樣，兩次造船就達到了八千艘。元代統一後，元朝廷為了海上軍事活動和大規模的海上漕運，令各地建造了大量船舶，其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了宋代。馬可·波羅（Marco Polo）曾見黃河上有屬於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蓋於必要時運輸軍隊赴印度海諸島者也。緣此地距海僅有一日程，每艘平均足容水手二十人，可載馬十五匹暨其騎者，與夫食糧軍械甲冑。這些例子都說明，元代統治者對造船的重視，直接推動了造船業的發展。在航海技術方面，元代在繼承宋代的基礎上也有了發展，劃分了東西洋以及更具體的海洋區劃，使海洋地理概念更加清晰。航行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從現有文獻看，宋時中國船之西航，似皆以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為終點，少有西航入波斯灣者。馬拉巴爾海岸在印度大陸的西南。元朝統一後，海上航線遠遠超過了這一區域（張箭，2003，頁 43）。馬可波羅（1254-1324）奉忽必烈（1215-1294）之命護送闊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國，其登陸地點在忽魯模思（今霍爾木茲）。這說明元代已經具備了遠航波斯灣的能力，通往波斯灣的航路也已成熟。在天文航海技術中，元代的遠航應用星辰導航技術更加嫺熟，在海外諸國之上。在天文航海技術中，中國船舶普遍使用了指南針，而海外諸國會使用指南針則不然。可見元代的造船能力和造船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趙世延，2022，頁 32）。

二、明代峰頂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1328-1398）開國肇建伊始，厲行海禁；因此，大陸沿海居民私下到台灣的機會並不多，但是由於宋、元以來，朝廷重視海外商業貿易活動，特別是福建泉州一地區，曾經是對外貿易的中心，吸引過無數回教世界的商人到此進行生意交易，閩南沿海一帶居民開風氣之先，對海上進行商業貿易早已形成了習慣傳統。明太祖的海禁，雖能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於一時，卻無法長遠加以禁絕。一部分居民鑽而走險，下海出洋，有的遠走南洋，有的前往日本，僑居海外的華人人數反增不減（鄭鶴聲、鄭一鈞，2009）。鄭和（1371－1433）是一位回族的探險家和航海家，中國也是歐洲以外少數具有遠洋航行能力。因此，明成祖曾多次命其率領船隊遠航至印度洋，這史稱「鄭和下西洋」⁴（鄭一鈞，2005，頁 219-223）。鄭和像及船艦 如圖 2、圖 3。鄭和航行的

⁴鄭和下西洋是指中國在明代早期 1405 年至 1433 年間的七場連續的大規模遠洋航海，跨越了東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以及東非各地，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航海項目。鄭和艦隊的七次遠洋有六次是在明成祖永樂年間（1402 年至 1424 年），而

目的主要有：一為安撫東南亞諸邦，「宣德化而柔遠人」；二為尋找惠帝允炆（張廷玉，2005，頁153）。「明史鄭和傳」這麼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

圖2

鄭和像



資料來源：鄭和明史人物誌

圖3

鄭和下西洋船艦之一



圖片來源：中國史稿地圖集

，欲覓蹤跡。」除此之外，還可以順便「耀威異域，示中國富強」⁵。鄭和出使西洋，始終抱持著「和順萬邦」、「共事天下太平」的宗旨，一秉「厚往薄來」，從不以佔領掠奪為目的，這是西方海權國家所不為的（謝台喜，2002）。在航行中，鄭和船隊採用了多種導航方式，主要有：被稱為「過洋牽星」的星座觀測方法，與使用羅盤測定針路的指南針方法。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海圖亦出自鄭和船隊，其中流傳至今的有茅元儀「武備志」中收錄的「鄭和航海圖」。鄭和探索了東南亞與南亞的大部分地區，如交趾支那、馬六甲、暹羅、爪哇、加爾各答、斯里蘭卡等。他還到達過波斯灣、東非與埃及。有少部份學者甚至認為鄭和曾經抵達過美洲大陸，也即是認為他先於哥倫布（1451-1506）發現了美洲，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早了將近九十年。認同學者代表人物當推「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作者孟席斯（1894-

最後的第七次遠航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間（1425年至1435年）。前三次遠航最遠到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而第四次最遠航行至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最後，船隊遠航至阿拉伯半島和東非肯亞[。《明史·鄭和傳》：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東、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

⁵明代多種文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鄭和傳》中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西山雜誌·三保太監下西洋》「永樂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鄭和、王景弘、張文等造大船百艘，率軍二萬七千餘。」顧起元《客座贅語·寶船廠》：「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假此蹤跡之。」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然而，關於鄭和船隊的航海目的、航行範圍等史實以及對七次航行的評價，仍存在爭議。

1978)。孟席斯這個驚人結論，是根據一幅 1459 年繪製的世界地圖所得（李琳琦，2019）。在沿途航經的國家，鄭和船隊用中國的特產換來了象牙、染料與寶石等商品，並為明代皇帝帶回了長頸鹿、駝鳥、金錢豹、獅子等珍奇動物（鄭一鈞，2005）。通過朝貢貿易，諸小國認可明朝的宗主國地位。當時西洋各國都積極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面得到豐厚賞賜。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 年），自 1405 年到 1433 年，鄭和率領一支特混艦隊，最多時有二百餘艘，是十五世紀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備的船隊。其船舶種類大致可分為寶船、馬船、糧船、坐船、戰船、水船等六種。從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長樂縣誌」：太平港在縣西半里許，舊名馬江。……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船於此，奏改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艦隊先後到過爪哇、蘇門答臘、馬六甲、暹羅（泰國）、天方（阿拉伯）、木骨都束（摩加迪休）等三十多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最遠曾到達東非、紅海、麥加（並且有可能到過澳洲），艦隊每次都從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內總共 7 度遠航。宣德八年四月初，艦隊結束最後一次航行，回程到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澤科德）時，鄭和在船上病逝，享年 62 歲。（白壽彝，1999，頁 55-56）鄭和下西洋路線如圖 4。

圖 4
鄭和下西洋航海路線



圖片來源：地理教室-無國界

鄭和的航海建立了亞非國際間的和平局勢（鄭一鈞，2005），促進了亞非國際貿易的發展，傳播了中國的文化，並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海外知識。但鄭和的航海並未帶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艦隊中的主力稱為「寶船」，寶船有 63 艘可運載明朝皇帝與南洋諸國互相饋贈的寶物，寶船之名就是由此而來。船隊可分五大類型工作，二萬多人各司其職，編制井然有序。有指揮決策、航海業務、海洋巡護、外交貿易及後勤保障等 5 部分（徐玉虎，1980）；李約瑟（1900-1995）評價，該時期歐亞任何一個國家的海軍，都無法與鄭和船隊相比。鄭和船隊在航行時的整體隊形像一隻飛燕，移動靈活，有利作戰。隊形的核心是四

艘帥船（指揮船），既安全又便於指揮和調度整個船隊，隊勢浩大壯觀。（鄭一鈞，2002，頁 219-220）鄭和的每一次出航，都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與征服，仿佛是一曲壯麗的海洋交響樂，奏響了人類文明交融的樂章。

〈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艘），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鄭一鈞，2005）。這些設有 9 桅 12 帆的大船，換算成現代公制，相當於長 138 公尺、寬 56 公尺、排水量千一百噸、可乘載上千人的巨艦，顯示當時中國造船業遙遙領先全世界。鄭和中國明朝航海家、外交家及宦官。有智慧、武功強、知兵習戰，深獲成祖信賴。永樂三年（1405）七月十一日，奉明成祖之命率領帝國艦隊開始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國家和地區，史稱「鄭和下西洋」，總航程達 7 萬多海里。鄭和下西洋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原王朝官方大規模組織的大航海，足足早了西方半個多世紀，其航程之遠及船隊規模之大，為當時罕見。鄭和自身角色認定，有世界史學者認為，是結合了帝國擴張、貿易促進及知識拓展，如其死前一年（1432 年）所立的石碑題文，除了有擴張宣稱「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亦有對商人和地理學家的敬重語：「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國，固遠矣，而程途可計。」是十五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因是明朝時期，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海上貿易逐漸興起。為了展示明朝的國威，促進與外界的交流，朱棣決定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海，進行外交和貿易活動。鄭和的壯舉對世界交通史和文化傳播史有重大影響（徐玉虎，1980，頁 20）。

肆、大航海時代與鄭和下西洋對世界的影響

一、大航海時代經濟

15、16 世紀，歐洲國家對外擴張勢力，開闢往東亞的新航路，發現美洲新大陸，縮短了亞洲與歐洲的航行距離，世界從此進入大航海時代（小松田直，1956，頁 138）。世界的經濟由「歐亞大陸的海陸經濟」時代轉變至「三大洋連結五大洲經濟」（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互通，經濟規模得以擴張連結至五大洲，宮崎正勝（2019）。這個時期見證了歐洲國家的航海探險和全球貿易的繁榮。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改變了各大洲之間的商業貿易格局，也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和經濟體系。

在西元 17、18 世紀時，一直以來不怎麼起眼的歐洲，能夠大幅成長為主導世界經濟的強大勢力，要歸功於大西洋和新大陸的存在。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開始對位於歐亞大陸西陲尚未被開發的大西洋，進行商業開發，為嶄新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資本主義⁶的誕生提供了絕好契機（宮崎正勝。2019）。西元十九

⁶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種生產方式為私有制、尋求利潤行為構成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包括資本積累、競爭市場、私有財產、財產權、自由交易和僱傭勞動。為市場經濟在

世紀，海洋帝國（不論何時都有領土處於白晝中的帝國，在全世界均有殖民地並掌握當時全球性霸權的帝國 (Lewis, 1989)。日不落國，英國掌控世界。歷史資歷尚淺的大西洋，需要發展出全新的產業和商業。荷蘭人具有商業頭腦和創新精神，對於商業活動的熱情和勇於冒險的性格為荷蘭大航海時代的興起提供有利條件。由於帆船的運送能力遠大於駱駝和馬匹，商業規模也一舉擴大，使得歐洲的經濟有大幅的成長空間。

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將大西洋海域視為「私海」以進行商業拓展，在征服了美洲大陸的諸文明後，進而大舉移民，並透過經營大農場（種植業）和開發銀礦等事業，獲得了諸多的經濟資源，逐漸將新大陸變成「第二個歐洲」哥倫布的航海不僅意味著地理上的新發現，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全新的文化、生物和經濟交流（宮崎正勝，2019）。哥倫布的航行引發了歐洲與美洲之間的交流，開闢了新的貿易路線，促進了貿易和文化的交融，新大陸上的豐富資源也為歐洲國家提供巨大的經濟機會。大規模生產和商業交易促進了世界經濟的成長。舊大陸的植物也透過新大陸的種植業而大規模生產，整個地球的生態因此產生莫大的變化。對飲食生活文化也帶來重大的影響改變。因此，在經濟方面努力構建一個公平和可持續的全球經濟體系，避免資源的過度開採和貿易的不平等，同時，我們也需要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觀念，以確保未來世代能夠繼續享受地球的寶貴資源。（鄭一鈞，2005，頁 414）

二、大航海時代政治

大航海時代是地緣政治所造成的結果，十五世紀，歐洲國家受「地緣政治」影響，傾全國之力到海外探索傳說中的印度，政治背景也對大航海時代的興起，對當時的歐洲國家之間存在著競爭和爭奪領土的需求激起重要化學作用。因國力強大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政治影響力，君王和教會紛紛資助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這種政治競爭促使航海探和殖民化活動的加速進行。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倫布抵達了他所稱之為「新世界」(New World) 的地方，實際上是現在的美洲大陸及鄰近群島後對這片新土地的稱呼，這次航海揭開新大陸的面紗，徹底改變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催生了一系列殖民化活動。大航海時代的擴張和探險活動導致了帝國主義的興起，歐洲國家建立海外殖民地，並將該地區視為自己管轄的勢力範圍 (Howe, 2002)，帝國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⁷，不僅強調政治主導權，也重視征服其他國家，使影響力擴張。和殖民化（即殖民者自稱殖民的正當性不在於其軍事和政治的先進，而在於種族上的先天優越性）也帶來政治控制嚴重的後果，殖民地居民經歷剝削和政治壓迫，他們被迫為殖民國

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存在著，誘發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的出現則較為晚，有著不同程度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在西方世界處於支配性地位並在全世界擴張，經濟成長乃資本主義一大特徵。

⁷ 帝國主義是通過獲取土地和/或強加經濟和政治統治來擴大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權威。

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特徵是 15 世紀至 19 世紀美洲的殖民化，以及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美國，日本和歐洲列強的擴張。古代中國、西亞和地中海的歷史是由無休止的帝國繼承所定義的。帝國主義只不過是富裕國家試圖維持其在世界力量平衡中的地位的必要結果。

縱觀歷史，許多原住民族土著社會和文化被帝國主義擴張所摧毀。

家提供勞動力和資源，導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許多殖民地地區的文化、傳統和資源遭受嚴重的破壞。以致倡導和平與合作的國際關係，避免衝突和戰爭，通過對話和合作，可以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Ergang, 1967)，重視平等和包容，尊重不同國家和文化的權利和尊嚴，是實現持久政局穩定社會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因素（張箭，2003，頁 40-41）。

三、大航海時代文化

大航海時代的發展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航海家們的航行帶來歐洲與其他地區文化的直接接觸，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得到極大的互動。尤其大航海時代帶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交流。歐洲傳教士和探險家帶來基督教，並將歐洲的文化和科學知識傳播到新大陸其他地區。

非洲、亞洲和美洲的文化、藝術和技術也傳入歐洲，為歐洲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提供新的啟示。天主教傳教士隨同航海家前往各地，傳播信仰，這導致許多地方文化和宗教的變遷。葡萄牙在殖民地建立大量的教堂和建築，這些建築融合當地和歐洲的建築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曼努埃爾式 Manueline 一種新的建築形式風格。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今天的墨西哥、秘魯等地，將歐洲的文化、語言和宗教帶到新大陸。西班牙人也從美洲帶回新的作物產品和手工藝品等及日常用品。（Cipolla & Carlo, 1970, p.54）

西班牙語成為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的主要語言，西班牙在殖民地建立許多學校和教會，傳播歐洲的教育和文化。荷蘭人在印尼等地建立殖民地⁸，將荷蘭的商業和文化帶到這些地區。荷蘭也吸收當地的香料、植物和文化。荷蘭黃金時代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透過全球貿易和探險，獲取大量的知性靈感和人文資源，推動荷蘭藝術化和科學化的社會繁榮。荷蘭大航海時代還導致歐洲文化與新大陸文化的交織匯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鶴聲，2009，頁 603）。增進更加公正和包容的國際關係，以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和全球共同貿易安全的目的，珍惜和保護人類的文化永續多樣性，並促進平等和和諧的文化共存共榮交流的平台。

至於**鄭和下西洋的影響**：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壯舉不僅影響當時的世界各洲商業貿易物原料的流通，更為後世提供遠航深刻的經驗啟示。鄭和的航海活動展示海洋的廣闊與神秘，激勵後來的航海家探索未知的勇氣與決心。正是這種探索精神，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新方向 (Bennet Peterson, 1994)。

一、**經濟方面**：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官方貿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開，遵循平等自願、等價交換等原

⁸ 殖民地完全由宗主國統治，沒有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獨立權力的非宗主國本土地區。15 世紀至 17 世紀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對非洲沿海地區的局部佔領，殖民的面積不大，內陸也沒有受到殖民者的殖民。列強於非洲的殖民始於 1415 年，葡萄牙帝國佔領休達，至現今仍由西班牙管三台（歐洲國家仍控制非洲一些小島作為海外自治領土，例如法國的留尼旺島）。

則，其使用的擊掌定價法傳為美談；明朝的商人們紛紛走出國門，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海上貿易網絡。民間貿易則由私人自發展開，據考證鄭和船隊的官兵便可以攜帶商品在沿線國家展開貿易。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的競爭。傳播水稻種植技術，幫助農民提高了產量，推動了農經的發展。

二、**政治方面**：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人夷邦政治體系。政治秩序由於是基於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用德來感化疏遠的國家，使其懷惠歸服）的觀念，是非侵略性的，鄭和船隊展示明朝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朝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這種朝貢體系是非霸權（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國國際政治體系。鄭和也被視為明朝的和平使者。（Wade, 2005, p.82）與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簽訂了友好條約。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包容，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文化方面**：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促進了明朝對外界的了解。鄭和下西洋，還留下《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也是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鄭和船隊的分船隊曾經到達天方國，帶回該國大清真寺的寫真畫本，加強中國和伊斯蘭教文化區的聯繫交流。崔瑞德、牟復禮

（2005）指出在鄭和的偉大航行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的強大與輝煌，更看到了一個開放、包容的文明形象。鄭和的貢獻，正如一幅宏偉的畫卷，描繪出一個國家與世界的深刻聯繫，也讓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體悟到文化交流的無窮魅力與價值（Bennet Peterson, 1994, pp.43-51）。鄭和下西洋不僅是一次商業活動，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與碰撞。鄭和不僅打通海上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珍貴物品交換之路，還帶回了異國的文化與風俗。在東南亞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推動了中南半島與中華的文化交流。

然而，大航海時代的影響和遺留歷史資料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世界改變，使我們認識到其中變遷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以開放的心胸來面對和處理相關問題，透過深入了解歷史，並積極採取有效行動，以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平等和平持續的未來（李琳琦，2019）。雖然成歷史遺跡，鑑古知今，台灣走過大航海時代歲月，曾經過海權國家佔領統治，目前台灣社會制度健全，政治民主，人民生活富庶安康，全是先人流血流汗建造出來的，應好好珍惜這得之不易的成果。鄭和的航海壯舉啟示我們，要珍視歷史，繼承和發揚優秀的文化傳統。

伍、大航海時代與鄭和下西洋對臺灣的影響

在大航海時代末期，十六世紀後半期到十七世紀初期，歐洲和東洋日本勢力風起雲湧、世界格局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之際，處在東亞大海之上的台灣，還是一個混沌未開的世外桃源，既不像君主朝代中國本土、日本那樣，已經自主形成有力的政治主體，也不同於琉球、朝鮮，從屬在龐大的中華帝國的

政治保護之下。這個時期的台灣，除了人數不多的各族土著先住民散居島上各地外，只有來自中國大陸南方沿海的零星漢人不時前來捕魚、交易，交換生活用品；或有一些海上武裝勢力，以它作為逃避官兵追捕的據點。偶而還有個別漢人移居島上，是為漢人遷移台灣的先驅（Von Sivers, 2017, p.3）。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黃教授秀政（1944-）研究看法得知，由於鄭和下西洋的各種直接史料，均未見有鄭和或王景弘到台灣或澎湖之記載：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均走西洋針路(航線)，其大寶船或分路在正常情況下均不可能到過台灣。鄭和下西洋的船隊缺乏到台灣或澎湖的動機。台灣海峽的海流險惡不利橫渡。因此「鄭和到台灣」傳說的可能性應屬極低。惟如鄭和船隊在台灣海峽遇到颱風，因風過此的可能性，則不能完全排除。在台灣，「鄭和到台灣」的傳說始終停留在民間傳說的層次。至於鄭和多次造訪的南洋各國，則因傳說的誇張渲染。鄭和的形象愈來愈大，乃至成為當地華人心目中具有神格的神祇，為南洋華人社會共同膜拜的對象。鄭和下西洋雖然看不出對台灣有直接影響（黃秀政，2020，頁 58），但大航海時代浪潮中海上霸權國家葡萄牙東來（當時看到的福爾摩沙）⁹西班牙荷蘭先後佔領台灣以及鄭成功退守台灣為反清復明基地具多方面影響。

一、經濟

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人基於商業利益與傳教目的前來東亞。荷蘭人在台灣發展貿易，並以台灣作為轉口站，台灣成為明朝、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交易方式仍係以物易物為主，也用珠子、白銀、布作為交易媒介。黃金原產於東台灣的海岸山脈，當地原住民於河川下游採集冲刷而成的砂金，經過多次轉手交易才流入北台灣，不過產量不足以大量供應。硫磺則是最大宗的出口物，盛產於內北投社（Ki-pataw）、金包里社（Ki-taparri），陳宗仁（2005）中國商人主要都為了收購硫磺而來。原住民係於 9-12 月採礦，只是中國的硫磺價格經常變動，中國商人不會定期前來收購硫磺（陳宗仁，2005，頁 251-253）

西班牙人統治以後，駐軍所需的物資以及貿易用的白銀都要從馬尼拉運來，補給制度就成為北台灣的經濟命脈。馬尼拉大多每年會派二次補給船，一次於八月、另外一次約為五月，把美洲來的白銀運到雞籠，以購買華商的絲、紡織品，再把商品運回馬尼拉販賣。雖然西班牙人不被允許和明朝展開正式貿易，但卻以免關稅、免貨物稅，甚至免入關查驗的方式，吸引走私商到雞籠作生意。西班牙人也試圖招攬日本商人，以把雞籠發展成中、日貿易的轉口港，不過德川幕府發布了鎖國令，這種期望從此破滅（戴寶村，2020）。

⁹由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翁佳音與編輯黃驗合著的專書「解碼臺灣史 1550-1720」，指出根據葡萄牙人到亞洲後的史料文獻，裡面記載的福爾摩沙是西北東南向，總長約 100 公里，但台灣是東北西南向，總長約 400 至 500 公里，推測葡萄牙人當時看到的福爾摩沙，極可能是琉球。可以確定的是，於 1554 年洛波·奧梅姆（英語 Lopo Homem）所繪的地圖中，在琉球群島之南，已繪有 Fremosa。「福爾摩沙」由來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 臺灣歷史檔案資源網. archives. ith. sinica. edu. tw. [2018-07-26].

因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過於依賴馬尼拉，貿易興衰取決於補給船有無載白銀來。有鑒於此，艾斯奇維曾建議引入中國、日本的農民前來開墾土地，但始終沒獲當局同意。所以自西班牙帝國的白銀貿易衰退以後，北台灣的經濟也開始蕭條，促使西班牙人退出台灣經營。

荷蘭東印度公司利用競標方式將某社的商業交易權外包給出價最高者，並且分四季向社商收稅，藉以增加財政收入。貿易目標係獲取中國的金和日本的銀，自 1636 到 1667 年間，從日本賺來的白銀有 7 成都被運來臺灣，除了購買中國貨物之外，再把其餘分給其他商館作資金。黃金則是運往荷蘭人在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商館。（陳宗仁，2005，頁 39-40）

荷蘭人從中國大量收購生絲、絲綢、瓷器、棉布等商品。生絲及絲織品轉賣日本、瓷器轉賣歐洲、棉布轉賣東南亞或供應臺灣本地。此外荷蘭人也從東南亞購入胡椒、丁香、蘇木等香料，賣至中國獲利。1635 年到 1640 年是轉口貿易的鼎盛期，絲貨的貿易額，佔荷蘭人賣到日本商品總值 8 成以上（陳國棟，2005）而這些絲貨有極大部分係從臺灣運來。然而 1640 年以後，中國開始蔓延戰亂，絲貨與瓷器的生產銳減，加上鄭芝龍為獨占日本市場，抵制華商運絲貨到臺灣，轉口貿易開始衰敗。貿易型態也由轉口中國商品，改為出口臺灣本地生產的鹿皮及砂糖。中國市場也受戰亂波及，對香料的需求減少，荷蘭人賣到中國的商品則改為鉛與硫磺，其中鉛從暹羅購入，而硫磺為臺灣出產（甘為霖，1903）。中國古代文化經濟史：「五商」組織為鄭成功掌握貿易活動與解決兵餉的利器，得以與滿清政府進行長期對抗，而鄭成功於台灣經濟史仍佔有一定比例。其中，以經貿與農業為主。於農業經濟方面，鄭氏政權推動屯墾政策原因是鄭氏軍隊大量來到臺灣，但當時的農業產量不足以供應軍隊所需的糧食。目的為了解決軍隊糧食不足的問題。不論鄭成功或鄭經基本上都貫徹「寓兵於農」的策略，也是諸將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鎮分地、按地開墾。這種具有營盤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於定則徵賦的經濟模式下，大量提供經濟產能。根據統計，包含承襲荷據已開墾的「王田」（翁佳音，2000）、後續開發的營盤田、官田、私田等。明鄭時期拓墾的田地超過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經濟開發，世界各報曾報導雖造就農耕文化盛行的漢人，但鄭氏王朝擴張領土的行動，卻也同時讓台灣原住民族面臨比荷西時期更嚴重的生存危機，導致與大肚王國發生衝突（李建霖，2015），並對平埔族展開屠殺。為了軍需民食，台灣農產重心由糖轉米。這個農業經濟的性格轉變直至今日仍影響台灣。西元 1665 年，陳永華的農業水利更促使漢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發展。除此，陳永華引進同安製鹽法至台灣來發展鹽業經濟，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產的外銷，因此多鹿的台灣，來自原住民團體的捕鹿業，也是早期台灣的重要經濟產業活動。鄭成功致力於開發農業並引進新的農作物，如稻米與甘蔗，這些措施不僅增加了台灣的糧食產量，還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他的經濟政策為後來永續發展奠定了基礎（李嘉祥，2006）。

二、政治

臺灣西班牙統治時期，為 1626 至 1642 年間，西班牙帝國於北台灣歷時 16 年的殖民統治。行政上屬於新西班牙總督轄區菲律賓都督府（李毓中、吳孟真，2006）。雖然台灣很靠近已是西班牙帝國版圖的呂宋島，西班牙人卻沒有完全佔領台灣，反而讓荷蘭奪得先機（甘為霖，1903）。直到 1626 年，為了突破荷蘭人對馬尼拉的貿易封鎖，才出兵雞籠，並逐步征服北台灣。可是西班牙人無力驅逐荷蘭人，也無法賺取足夠的利潤來維持駐軍的花費，反而要靠馬尼拉補助北台灣的經營。因此馬尼拉經濟衰退以後，西班牙人就縮減駐軍，給了荷蘭人可乘之機。最後在 1642 年荷蘭人攻陷雞籠，結束西班牙人的統治。至於在荷蘭人占領台灣的前夕，台灣社會的主體還是保留了其原始社會的風貌，但是隨著東亞海上貿易的轉趨頻繁和漢人、日本人及西洋人的先後到來，台灣島上正預示著新的變局（周明峰，1994，頁 27）。以中、日、歐勢力在台灣海峽上的角逐相互動為起點，因此，台灣的歷史寫下了新的一頁。

臺灣荷蘭統治時期，指的是臺灣在 1624 至 1662 年的這段期間，當時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與聯合東印度公司於臺灣統治範圍的統稱，影響力遍及臺灣中部與南部沿海。若將澎湖群島與臺灣本島兩者視為一體，則 1622 年荷蘭人建風櫃尾城堡可視為本時期的開端（楊彥傑，2000，頁 20）。

明鄭成功（1624-1662）政權於 1661 年 3 月 30 日至 1662 年 2 月 1 日期間征服荷屬福爾摩沙的戰役勝利，主要戰場位於臺灣西南沿海的赤嵌、臺江內海、大員等地；該役延平王鄭成功親率由泉漳兩府官兵組成的明鄭水師 25,000 人自同安縣之金門航渡台灣海峽，4 月 30 日清晨由鹿耳門水道進入臺江內海，先登陸攻佔普羅民遮城，然後在多月圍困熱蘭遮城下，終於迫使荷蘭東印度公司守軍於次年 1 月底實質投降，荷蘭統治臺灣前後共約 38 年之後退出臺灣。

鄭荷雙方在 1662 年 2 月 1 日簽訂正式合約。荷蘭人寫了條約 18 條，鄭成功以漢文寫了 16 條，雙方互換條約。這場戰爭結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的統治，開啟了臺灣明鄭時期。鄭氏政權治理臺灣的時間只有二十多年。西元 1683 年清帝國派兵攻打臺灣，隔年，臺灣成為清帝國統治的領土。鄭成功在台灣的治理建立了相對穩定的政權，他對於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定的調和。他推動漢人移民，以加強對台灣的控制，這對後來的台灣社會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此外，他的政府在維護社會秩序以及抵抗外敵的方面也表現出色（陳錦昌，2004，頁 301-302）。

三、文化

西班牙人之所以佔領台灣，除了政治以及經濟因素外，也考量台灣的位置方便前往中國、日本傳教，起初就派了 5 位神父隨軍出征。前來的傳教士大多出自道明會，不過也有其他的教會參與起初只有軍人才能進入原住民的村莊，並無神職人員在村內活動，直到神父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 1595-1633）抵台灣後，才獲准入村傳教。艾斯奇維（1595-1633）為了培育傳教士，在阿爾卡拉索（1626-1642）的支持下，成立了聖慈悲兄弟會，會長一律由長官擔任；原本他還打算創辦神學院，只是始終未能實現（李毓中、吳孟真，2006）。原本西

班牙人的傳教範圍，只限於基隆、淡水城堡外附近的部落。西班牙統治者在金山、三貂角（San Diego）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試圖向原住民傳教。西班牙神父也研究原住民語言，著有臺灣島淡水語詞彙（翁佳音，2006）。只是好景無法維持多久，從北台灣裁軍以後，西班牙勢力大幅衰退，傳教士也就無力遠離城堡去傳教。基本上原住民係考量部落的安全，才肯接受天主教。天主教最早於臺灣傳教的地點是在西班牙人建立的諸聖教堂，這座教堂鄰近聖薩爾瓦多城，遺址位於今基隆市和平島（陳宗仁，2005）。將原住民族改宗教信仰成基督徒，也是荷蘭統治時代的施政重點，而西拉雅族的部落最接近熱蘭遮城，因此宣教士便從西拉雅部落，開始推動基督教信仰。當時西拉雅人的某些社會風俗，並不相容基督教義，荷蘭人對臺灣文化的影響是為了傳播基督教，荷蘭人建立教堂和學校。荷蘭人使用羅馬字母拼寫部分原住民族的語言，留下文字紀錄。以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族的語言，在聖經呈現兩者的對照，以利向原住民族傳教、說明教義。原住民族利用羅馬字母拼寫文字與漢人簽訂土地契約，這種文字到清帝國時期仍在使用的（Dicks, 1970）。雖然宣教士試圖讓原住民族接受基督教，然而原住民仍然透過原有的文化風俗，加以理解基督教。對於基督教的價值觀，也是選擇性接受，原住民族可以接受夫妻共居、共育子女的精神，然而夫妻須白頭偕老，則未必能接受（康培德，2005，頁 259-260）。

西元 1661 年，鄭成功抵台灣建立政權起，臺灣文化，即受到漢族的閩南人與客家人等族群的移民文化的影響（戴天昭，1996），開中華制度之始，但未致力於推行漢字文化圈漢文教育。鄭經（1642-1681）繼承王位後，初期亦因忙於對抗清荷聯軍而無暇文教；直至 1664 年敗退東寧才開始建設並推行台灣文教。鄭經鮮少親理政事，多委由宰輔陳永華掌理。鄭氏政權有計劃的在臺灣植入漢文化，於 1665 年在臺南建先師聖廟，設國子監，是為漢文化的「全臺首學」；起初，鄭經以「荒服新創，不但地方侷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等語推辭，但在聽完陳永華以下言論之後，鄭經立刻下令擇地興建聖廟。興建孔廟、設立學校，傳播漢人文化。興建孔廟，倡導儒家思想，臺南市孔廟是臺灣最早的孔子廟（林珮瑩，2011），裡面有當時官方最早設立的學校，明倫堂便是當時學生學習的場所。興建至今已三百多年（韓石爐，1957），常會進行整修，目前已成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設立學校，教授人民四書、五經，另外將荷蘭人、西班牙人在臺灣興建的教堂改建為學堂，聘請老師教學生習寫漢字，使百姓能讀書識字。制定考試制度，選拔人才。影響漢人的儒家思想制度和文化開始在臺灣發展（陳錦昌，2004）。鄭成功統治下的台灣也開始形成獨特的文化特色。他提倡儒家學說，支持教育事業，設立學校，培養新一代的人才。鄭成功的英勇事蹟成為後世廣為傳頌的英雄傳說，對台灣的歷史文化認同有著重要的影響（宋貴龍，2008）。

鄭成功佔領台灣的歷史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其對於台灣歷史的影響卻是長遠而深刻的。他的軍事才能、治國方針以及文化構建，無不為台灣的未來鋪下重要的基石。即使在他去世之後，明鄭政權依然在台灣持續存在，並為後來的

歷史發展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陳錦昌，2004，頁 300-304）。

陸、結語

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商業貿易動機，是由於亞洲商品的高度需求，歐洲國家希望能夠直接獲取這些珍貴商品而不依賴中東和東地中海貿易商人交換。這促使他們尋找新的航路。於大航海時代之前，歐洲的航海技術相對起步較晚。然而，隨著科技進步和航海知識的累積，歐洲人開始勇敢地面對未知航海領域，尋找新的海上航線。在競爭與國家利益上歐洲國家之間的推動了航海探險的發展，西班牙、英國、荷蘭等國家都試圖在探險中占據優勢地位，以拓展殖民領土、獲取資源財富和增強國家實力。是以，西方歐洲人積極前往世界各地探險與自由商業貿易，透過相對進步的航海技術，較具有先天的冒險精神與新武器等等優勢，對全世界進行了掠奪與殖民地擴張登上新大陸。這些掠奪與殖民統治民進一步引發了科技與制度的發展，導致歐洲在工業革命時期整個脫胎換骨，形塑了邁向現代化世界的樣貌（O'Sullivan, 1970）。大航海時代是人類航海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全球化指標的開始。

歐洲列強透過探索和征服，在全球發現許多新的島嶼陸地建立殖民屬國，織起跨洲際的商業貿易網路，大力推動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Wang, 2023）。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全人類大航海時代一個重要階段，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航海思維變革和發展，其對全球擴展和交流的影響。大航海時代以後，歐洲諸國將亞洲的傳統農業社會，以及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區的原住民社會變做政治殖民化，其中以繼承了維京人歷史的英國最占優勢，曾造就日不落帝國¹⁰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說：「在朕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的海洋國家。而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蘭人的東來，在台灣海域周遭角逐爭鬥，台灣與歐洲人開始出現了互動，讓台灣在東西兩大世界碰撞下，扮演了關鍵角色，開啟了台灣近代的歷史（湯錦台，2022，頁 17）。

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一頁，也是世界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印記。鄭和 7 次下西洋展開了多元的海上絲路貿易，更有很多小國特意來到明朝進行朝貢（鹿荷，2005，頁 20），正如鄭和所言：「人心齊，泰山移。」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以鄭和的精神為指引，推動各國之間的友好交流與合作，共同迎接未來的挑戰與機遇。在政治上是希望明朝強大實力可以保護他們，在經濟利益上則是得到了各種豐碩的資源財富，還有一種是官方的商業貿易交流，在官方的見證下與各國的商船隊進行來往貿易，包括銅錢、珠寶、瓷器和絲綢等，都是具有中華傳統特色的產品，在非洲，鄭和的船隊更是帶來中國的科技與文化，尤

¹⁰ 日不落帝國 指不論何時都有領土處於白晝中的帝國，通常用來形容繁榮強盛、在全世界均有殖民地並掌握當時全球性霸權的帝國。而今該詞在一定的場合用來形容帝國主義，而未必特指某一統一的國家政體。另外目前世界上還有嚴格物理意義上的「日不落帝國」，比如在世界各大洋保留島嶼海外領地的現代英國和法國，在任何時候都有其領土或海外領地處於白晝中。但由於其綜合國力並未達到全球性霸權，所以並不被視為傳統意義上的「日不落帝國」。

其是在天文、醫學和航海等方面，影響深遠（翦伯贊，2006，頁 124）。還有一些民間的自由貿易，另外還把中華先進固有文化和技術比如：禮儀文化、儒家思想、農業手工業技術、建造雕刻技術、度量衡和曆法等傳播到海外，深受歡迎（Rossabi, 2013）也促進各國人民的生產技術發展、豐富各國人民特有文化生活水準和建立了深厚情感友誼。鄭和的成功在於他能夠以開放的心態與各國觸動，深度互動學習，促進宗教文化交流。這都是鄭和下西洋帶來深遠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 〔清〕王鴻緒、萬斯同（1996）。**明史稿**。北京出版社。
- 〔清〕張廷玉等（1974）。**明史列傳：鄭和傳**。北京出版社。
- 小松田直（2012）。**圖解世界史**（黃秋鳳譯）。城邦文化。（未註原著出版年）
- 中國航海學會（2003）。**中國古代航海家：鄭和**。航海學會。
- 王晴佳（1999）。**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允晨文化。
- 白壽彝〔主編〕（1999）。**中國通史**。上海出版社。
- 甘為霖（1903）。**荷蘭人統治下的台灣**。前衛出版社。
- 周宗賢（1989）。**逆子孤軍—鄭成功**。久大。
- 李士厚（1983）。**鄭和家譜首序**。晨光出版社。
- 李琳琦（2019）。**鄭和如何成為中國航海先驅**。
<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84>。
- 竹田勇美（2021）。**海上霸權：從捕鯨業到自由航行的海洋地緣史**（鄭天恩譯）。燎原。（原書出版於 2019）
- 阿瓦列斯（Alvarez, J. M.）（2006）。**西班牙人在臺灣**（李毓中、吳孟真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著出版於 1930）
- 阿諾德（Arnold, D.）（2003）。**地理大發現**（聞英譯）。上海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1983）
- 阿諾德（Arnold, D.）（1999）。**地理大發現**（王國璋譯）。麥田。（原著出版於 1983）
- 宮崎正勝（2019）。**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賴詩韻譯）。時報出版社。（未註原著出版年）
- 張 箭（2002）。**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
- 張芝聯〔主編〕（2009）。**法國通史**。北京大學出版。
- 張彬村（1990）。**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 梁啟超（1905）。**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新民叢報。
- 邱樹森（1984）。**鄭和先世與鄭和**。**南京大學學報**，4（2）。
- 伯希和（Pelliot, P.）（2003）。**鄭和下西洋考**（馮承鈞譯）。中華書局。（原著出版於 1933）
- 徐玉虎（1980）。**明鄭和之研究**。德馨室出版社。
- 鹿荷編（2005）。**七下西洋：鄭和**。驛站文化。
- 莫里遜（Morison, S. E.）（1998）。**航海家哥倫布**（陳太先、陳禮仁譯）。上海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1942）

- 馬駿杰 (2021)。海上傳奇：中華海洋文明發展通史。中華出版社。
- 陳錦昌 (2004)。鄭成功的台灣時代。向日葵文化。
- 陳宗仁 (2005)。雞籠山與淡水洋。聯經。
- 陳國棟 (2005)。臺灣的山海經驗。遠流。
- 湯錦台 (2022)。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如果出版社。
- 康培德 (2005)。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麥格夫 (2006)。宗教改革運動思潮。基道出版社。
- 翁佳音 (2000)。臺灣近代初期史。臺灣文獻，51(3)，263-281。
- 趙世延 (2022)。大元海運記漕運水程。文物出版社。
- 鄭一鈞 (2005)。論鄭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
- 鄭鶴聲等〔編〕(2007)。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海洋出版社。
- 鄭鶴聲等〔編〕(2009)。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海洋出版社。
- 鄭自海、鄭寬濤 (2005)。鄭和家世研究資料彙編。N/A。
- 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2020)。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1905 年至 2005 年的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北京海洋出版社。
- 南京鄭和研究會〔編〕(1998)。鄭和與海洋。南京鄭和研究會。
- 楊彥傑 (2000)。荷據時代台灣史。聯經。
- 黃雲眉 (1956)。明史紀事本末。上海出版社。
- 黃秀政 (2020)。台灣政治史。教育學院。
- 韓石爐 (1957)。鄭氏時代的臺灣文化。臺南文化，7 (2)，99-101。
- 翦伯贊〔主編〕(2006)。中國史綱要。北京大學出版。
- 謝台喜 (2012)。鄭和下西洋動因之探討。中華鄭和學會。
- Bennet Peterson, B. (1994). The Ming Voyages of Zheng He 1371-1433. *The Great Circle*, 16 (1), 43-51.
- Boies, P. (1970).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E. & Casper, M. (2001). A defini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3), 465.
- Cipolla, C. (1970).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Penguin.
- Daniels, P. S. & Hyslop, S. (2006). *National Geographic Almanac of World History*.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Dawson, R. S. (2019).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hoenix Press.
- Dicks, D. R. (1970). *Early Greek Astronomy to Aristotl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illon, M. (1998). *China*. Routledge.
- Ebrey, P. B. (2013). *Pre-Modern East Asia*. Cengage Learning.
- Ergang, R. (1967). *The Renaissance*. Van Nostrand.
- Howe, S. (2002).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S. F. (1989). *Imperialism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Min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ove, R. S. (2006). *Maritime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1415–1800*. Greenwood Press.
- Morris, T. A. (1998).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outledge.
- O'Sullivan, D. (1984). *The Age of Discovery 1400-1550*. Longman.
- Parry, J. H. (1981).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tter, D. (1998).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Selected Documents*. Red Globe Press.
- Rice, E. F. Jr. & Grafton, A. (1999).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1460–1559*. W. W. Norton & Co.
- Rossabi, M. A. (2013). *History of China*. Wiley-Blackwell.
- Swaine, M. D. & Tellis, A. J. (2000).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AND.
- Von Sivers, P. (2017). *Patterns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de, G. (2005). The Z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8(1), 37-58.

Age of Discovery and Zheng He's Voyages

Haw-jiun Chiu*

Abstract

The Age of Discovery (c. 1418 – c. 1620), also known as the Age of Exploration, was part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largely overlapped with the Age of Sail. It was a period from approximately the late 15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during which sea farers from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explored, colonized, and conquered regions across the globe. The Age of Discovery was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in world history when previously isolated parts of the world became connected to form the world-system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globalization. The era saw widespread enslavement, exploitation and military conquest of native populations, concurrent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influence and spread of western and European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ing to a faster-than-exponential population growth world-wide. In the 15th century (1405-1433) when Zheng He began his trip, there emerged a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world history, which were brought about by the great discovery. In Yongle and Xuande years of Ming dynasty, the sea route traffic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Zheng He's seafaring, and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porcelain production. The scale of Zheng He's navigation far exceeds that of Columbus' great discovery, which followed, this big ship here was the one sailed in by

zheng he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on his great voyag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and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to east Africa.

Keywords: Age of Exploration, silks and Chinawares, new commercial, Zheng He's Voyages. great discovery

*James Haw-jiun Chiu. Professor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January 14, 2025. Accepted: February 17, 2025.